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本期作者：黄宇兴

主编：杨光斌

总第十三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阅读提示

世界秩序稳定和变革的原因是什么？“世界秩序”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概念。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和“世界政治理论”均关心和讨论世界秩序问题。然而，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重点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既有研究或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缺少对体系变革的动态分析，或依赖大国战争等突变因素解释国际秩序变化从而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的秩序的稳定与变革。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问题。“世界秩序”的概念不仅涵盖了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要素，而且强调行为体种类的多样性与行为体自身的变化。世界市场、行为体种类与变化、政治思潮共同解释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世界市场和行为体自身变化发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长时段”分析和时段划分是研究世界秩序的重要方法。本文将阐述“长时段”分析的特点，并依托“世界政治理论”讨论世界秩序的周期与秩序转化。近500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1500—1750年的“帝国建立”阶段、1750—1890年的“帝国主导”阶段、1890—2010年的“帝国内战”阶段以及2010年至今的“帝国分包”阶段。阶段之间的转化遵循渐变逻辑，由世界市

场、行为体种类/变化和政治思潮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在解释世界秩序稳定与变革时，“世界政治理论”的范式相对于既有研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2008—2010 年以来，世界秩序转型存在若干新的特征，如“异类”国家的崛起、秩序的加速分裂、公民“反叛”的加剧等。世界市场的扩张、全球化分配不公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改变了美国及其盟友与世界的关系。2008—2024 年，“帝国分包”政策依托美国已有的霸权而运行，但这一政策试图以政治逻辑凌驾于世界市场之上，从而人为拉高了政策的经济成本。同时，这一政策也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美国的“帝国分包”政策有一定效果，但效率不高。美国长期维持“帝国分包”秩序的稳定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核武器相互威慑等因素使得世界继续处于“大国无战争”的状态，那么“帝国分包”秩序可能按照“世界政治理论”预测的以下三种方式解体：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深化，且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失去了物质性权力的优势。二是世界市场加速发展，且美国不断发展的民粹主义导致政府选择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三是在国内外经济社会矛盾面前，政府陷入危机且无力摆脱危机，从而导致美国的民族国家职能逐渐退化。继续尝试维持“帝国分包”秩序对美国和对世界均非福音。

目 录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体系、秩序、稳定、变革 4
三、“长时段”分析 16
四、世界秩序分析 31
五、结论 51
参考文献及注释 57

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1]

黄宇兴

作 者：黄宇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世界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键词：世界秩序，“长时段”，世界市场，行为体，政治思潮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秩序稳定和变革的原因是什么？“世界秩序”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概念。在理论层面，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和“世界政治理论”均关心和讨论世界秩序问题。在现实层面，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和近一年来美国政府的更迭深刻塑造了世界秩序。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权力和影响的增长在什么层面改变了世界秩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新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何美国的政策迅速改变了世界秩序？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崛起和特朗普总统重新当选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变革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理解世界秩序就成为学术研究的应有题中之义。然而，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重点是“国际

体系”与“国际秩序”。既有研究或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缺少对体系变革的动态分析，或依赖大国战争等突变因素解释国际秩序变化从而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的秩序的稳定与变革。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问题。“世界秩序”的概念不仅涵盖了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要素，而且强调行为体种类的多样性与行为体自身的变化。世界市场、行为体种类/变化、政治思潮共同解释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世界市场和行为体自身变化发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长时段”分析和时段划分是研究世界秩序的重要方法。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将阐述“长时段”分析的特点，并依托“世界政治理论”讨论世界秩序的周期与秩序转化。近 500 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 1500—1750 年的“帝国建立”阶段、1750—1890 年的“帝国主导”阶段、1890—2010 年的“帝国内战”阶段以及 2010 年至今的“帝国分包”阶段。阶段之间的转化遵循渐变逻辑，由世界市场、行为体种类/变化和政治思潮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2008—2010 年以来，世界秩序转型存在若干新的特征，如“异类”国家的崛起、秩序的加速分裂、公民“反叛”的加剧等。世界市场的扩张、全球化分配不公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改变

了美国及其盟友与世界的关系。“帝国分包”秩序的运行存在内在压力。

本文将首先阐述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之后分析既有理论分析世界秩序问题的特点与局限。研究问题的转换带来不同的研究议程。史观不同，则研究者对历史周期的认识不同。历史时段的不同划分方法引出了对世界秩序稳定与变迁的不同观点。本文将讨论既有研究对“长时段”的划分方法，并依据世界市场、行为体的种类/变化和政治思潮的变化分析世界秩序近 500 年的稳定与变革。本文尝试做出三个贡献：第一，提炼“世界秩序”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世界政治理论”的被解释对象。第二，在“世界政治理论”的框架中补充行为体种类/变化，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世界市场的渐变和行为体的渐变解释世界秩序周期之间的性质变化（即“秩序变革”）。行为体的种类和政治思潮解释每个周期内的秩序稳定和秩序的程度变化。第三，应用所提框架分析近 500 年的世界秩序稳定与变革。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在解释世界秩序稳定与变革时，“世界政治理论”的范式相对于既有研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二、体系、秩序、稳定、变革

（一）概念

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是三个递进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拓展。国际体系指主要大国的能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国际秩序指国际体系与国际规则或国际制度的总和。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相比，世界秩序指各类行为体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2]

世界秩序的概念存在三个特点。首先，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研究仅仅或主要研究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主义看来，无论是前现代的城邦国家、工业时代的小国还是全球化时代的霸权国，它们之间仅存在规模差异和由此导致的能力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体制的政治实体之间不存在性质差异。因此，研究者依据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出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结论，适用于从古到今的各类行为体。[3] 与之相比，世界秩序的研究对象不排斥民族国家，但尝试讨论不同种类行为体（如封建君主、殖民公司、国际工人运动、恐怖主义组织、跨国公司等）对秩序的稳定和变革的影响。例如，“9·11”恐怖袭击塑造了 2001—2012 年美国的对外战略和美俄关系、中美关系。恐怖主义组织在十多年里影响了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无论是研究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还是世界秩序，研究者不应假定民族国家是唯一或主要的行为体。世界秩序研究不排斥对国际体系或者对国际秩序的研究，但是并不仅限于讨论民族国家建构的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其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研究假定民族国家这一行为体不发生变化，而世界秩序研究强调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类行为体均发生重大变化。[4] 例如，近 500 年来，罗马教廷逐渐退出了民事管理的领域。其对民族国家相互关系的影响逐渐下降。又如，殖民公司的发展为民族国家创造帝国奠定了条件（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英国建立印度殖民地创造了条件），也为殖民公司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奠定了条件（如哈德逊湾公司为加拿大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早在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之前，世界已经联系在一起。而世界秩序在民族国家出现前后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分析不同时代世界的稳定与变化时，研究者不应假定民族国家不发生变化。同时，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反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社会运动”（即“反体系运动”）也在不断发展。由此，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类行为体均在不断变化。将上述变化纳入分析范畴是世界秩序研究的重要特点。

最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研究将权力界定为物质性的权力，特别是依据军事和经济能力界定大国。与之相

比，世界秩序研究并不排斥物质性权力，但同时关注权力的社会属性。换言之，权力的来源不必然是物质性的。文化、规范、意识形态、政治思潮等也是形成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在研究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时，研究者首先根据物质力量界定权力，如界定“大国”、“小国”等概念。研究者可能将国际制度或国际规则作为过程性结构分析其影响。而在研究世界秩序时，研究者会将跨国意识形态等作为权力的来源，并分析“在物质条件不发生变化下为何秩序发生变化”等问题。研究者将国际制度或者国际规则作为导致秩序稳定或者变迁的结果而非原因。综上所述，“世界秩序”的概念脱胎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概念，而又不限于已有概念的范畴。讨论“世界秩序”的概念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以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提出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和“世界政治理论”均关注世界秩序的演变问题。既有理论为研究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奠定了基础。以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国际体系是稳定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军事能力界定的“极”数决定了国际体系是否稳定。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稳定。结

构现实主义的主要案例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形成的均势带来稳定。[5] 这一理论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但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这一理论对“稳定”的概念做了狭义的处理，即将“稳定”定义为“大国无战争”。然而，大国之间可能有各种方式的激烈竞争，如军备竞赛、经济制裁等。如果主要大国之间频繁进行这样的政策实践，国际体系是稳定的么？其次，这一理论是个静态理论，缺少体系之间的转换机制。该理论将大国之间的均势视为长期稳定的因素。由此，大国之间的稳定就是常态。然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国之间的能力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暴力方式（如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和平方式（如苏联解体）均可能导致“极”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不同方式均可能导致“极”数的变化？最后，这一理论的主要案例是冷战期间国际体系的“稳定”。然而，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例。对这一案例存在竞争性解释（如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导致“稳定”），而仅依据这一案例发展理论也使得结构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缺少历史视角”的分析（ahistorical analysis）。因此，结构现实主义难以解释历史过程中的秩序变迁。

结构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现实主义流派更为关注国际体系的变革，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是将古典现实主义和权力

转移学派相结合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与沃尔兹的理论相比，吉尔平的理论有三个特点。首先，吉尔平明确将国际体系变革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克服沃尔兹的静态范式带来的问题。其次，吉尔平明确将军事能力强大的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尝试将自己的研究范式与沃尔兹的研究范式兼容。最后，吉尔平将大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大国的过度扩张作为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尝试解释历史过程中的国际体系变革。[6] 吉尔平提出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国际体系变革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做了重要补充。然而，他的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为何仍存在国际体系的变革？在吉尔平的有生之年，他能否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苏联解体导致的国际体系的变革？按照他的观点，苏联的过度扩张引发了其解体导致国际体系变革。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苏联的过度扩张是其解体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么？即使研究者承认这种有争议的观点，苏联的解体也没有导致大国战争。由此，研究者能否以大国间是否爆发战争作为划分国际体系变革的依据？

为了回应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以强调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不再讨论国际体系问题，转而研究国际秩序问题。[7] 自由主义学派中以研究国际秩序而闻名的学者是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作为一个几乎将全部学术生涯放在以自由主义视角研究国际秩序的学

者，他的关注点不仅包括国家间物质权力的分配，也包括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的重大作用。从早期研究美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自我约束到近年来研究“自由国际秩序的韧性”，他将规则和制度视为秩序稳定的来源。而以“韧性”为研究主题则表达了他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稳定性。[8] 这种理论的优点在于尝试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国际秩序的变化。然而，这种理论不恰当地将“自由国际秩序”的稳定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甚至历史的必然归宿。因此，这种理论并不讨论所谓“非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系。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存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国际秩序在全球层面是分裂的。这表明“自由国际秩序”的稳定性面临来自外部的重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对这种秩序的稳定性的挑战来自“自由世界”的内部。近年来，特朗普总统再次当选后调整了美国对国际组织、发展援助、关税等方面的政策。全球舆论对特朗普总统政策评价观点各异，但所有评论的共识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塑了国际秩序。当国际秩序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时，“自由国际秩序”的“韧性”的程度就成为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伊肯伯里的研究强调秩序的稳定，而阎学通的研究则强调秩序的变革。他所倡导“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主要

大国的道义水平决定了其领导类型，塑造了其领导能力，进而影响国际秩序。“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国际秩序变化体现了包括霸权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的道义水平的变化。当主要大国的不同道义水平导致追随其国家的数量和质量发生变化时，国际领导权和国际秩序就发生了变化。[9]“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了两个贡献，一是在物质能力分配的基础上引入了道义水平界定领导国家的能力。这体现了权力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集成，从而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二是不再满足于解释国际秩序的稳定，而是尝试同时解释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变革，从而构建了对国际秩序解释的充分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道义现实主义”也存在尚待研究的问题。首先，道义的基础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道义基础有何变化？其次，判定道义的标准是什么？对此问题可能有两种解答，一种解答认为没有客观标准，另一种解答认为追随者的数量和质量构建标准。前者将导致概念的测量和有效性受到影响，而后者将导致研究者难以区分国家追随的动机。毕竟，弱小国家对领导者的追随可能是道义驱动的，可能是利益驱动的，更可能是机会主义和混合性的。最后，对领导人和领导国家分类的依据是什么？“人”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在不同研究层次方面，是否存在对个人或国家“不重不漏”的分类？“道义现实

主义”的分类基础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政治学的。这增加了“道义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解释力；但这也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分析单元（国家）是一个集合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是不同的。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考察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才可能更具生命力。

与“道义现实主义”相同，“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也尝试解释国际秩序的变化。这两种理论流派存在三个明显的共性。首先，“英国学派”定义的“国际社会”的概念同建构主义定义的“国际秩序”概念非常类似，即在承认物质性权力的情况下强调观念性、规范性和文化性的权力。[10] 其次，“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高度重视秩序的历史演化问题。“英国学派”强调在长时段内考察秩序变化。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建构不同类型的关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形成国际体系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不同国际体系中出现演变。不同的文化环境塑造了国家间的战争与合作，进而塑造国际秩序。[11] 最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高度重视秩序在地区层面的差异。“英国学派”明确提出应以全球（而非“欧洲中心”）的视角看待秩序的历史演化。建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地区，规则和制度是不同的。因此，国际秩序是地区秩序构成的。[12] 由此，在分析国际秩序时，“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能够较好地解释秩序的变化和差

异。

然而，“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的研究也存在值得讨论之处。首先，“关系本位”中的行为体是否同质？例如，民族国家—殖民公司的相互关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何种异同？“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并不尝试回答这类问题。其次，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在塑造秩序时的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是什么？“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强调非物质因素的意义。这是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的一种必要反思。但“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非物质因素的解释缺少必要的测量和评估。再次，关系/文化的变化是秩序变革的动力还是秩序变革的结果？“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均强调关系/文化和行为体的“互动”。因此，秩序变革的动力和结果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最后，国际秩序是地区秩序的数量加总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性质差异？“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地区秩序有强烈的学术兴趣，但对世界秩序的兴趣却略显不足。一方面，强调地区差异性有助于校正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秩序研究。另一方面，放大地区秩序之间的差异使得世界秩序成为相对次要的学术命题。

（三）“世界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差异很大，其中一个表现是对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在塑造秩序方面的作用存在争论。同时，上述流派的共同点是假定民族国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与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世界政治理论”介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强调非物质因素对塑造秩序的重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在分析世界秩序时，“世界政治理论”尝试引入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并讨论行为体的变化。

王缉思和杨光斌的“世界政治理论”开拓了新的研究议程。[13] 首先，王缉思和杨光斌不再仅仅关注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而是转而讨论世界秩序问题，并将其作为“世界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就为理论范式纳入行为体种类和每类行为体的历史演变提供了空间。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看待世界秩序的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作为体系的“两极”在四十多年里未发生重大变化，而民族主义思潮的扩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塑造了世界秩序。按照沃尔兹的理解，冷战的国际体系是稳定的。但按照王缉思和杨光斌的理解，冷战包含了民族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的政治过程。因此，冷战在多数时段内谈不上“稳定”。

其次，王缉思和杨光斌不再仅仅讨论物质因素塑造世

界秩序的原理，而是聚焦于非物质因素（如政治思潮）的作用。与物质因素相比，政治思潮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一方面，在物质因素对比受限于政治边界和地理空间的情况下，政治思潮的形成和传播跨越了国家边界和地区界限。另一方面，在物质因素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政治思潮的演变解释了世界秩序的变化。这就使得以政治思潮解释世界秩序存在两个明显优势——全球层面的联系性、解释机制的动态性。

最后，与王缉思相比，杨光斌的研究更强调分析世界秩序的历史演变。如前所述，在世界联系成为一体和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即 1500 年左右至 19 世纪末期），世界秩序已经成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除“英国学派”学者和若干建构主义学者外，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对这一阶段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变化和影响的兴趣不大。“英国学派”的确讨论了民族国家形成前的世界秩序问题，但其以区域划分秩序的方法削弱了对世界秩序作为研究整体的相关讨论。因此，杨光斌讨论世界秩序演变的历史为提出新的世界史观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史研究和叙事则必然会影响关于世界秩序问题的理论建构。[14]

已有的“世界政治理论”的相关成果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首先，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相同，“世界政治理论”也需要讨论秩序变革动力中的物质因素与非

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仅强调非物质因素（如政治思潮）的解释因素是不充分的。因此，近年来“世界政治理论”的相关研究已开始更多地关注世界市场和资本运行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将全球化作为塑造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15] 其次，“世界政治理论”已经比较充分地分析了政治思潮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作用。世界市场的发生的变化是缓慢发生的，而政治思潮的变化速度则比较快。因此，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解释世界秩序的逻辑是互补的，组合之后可同时解释秩序的稳定与变革。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世界政治理论”需要考虑政治思潮本身的分类和变化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而这是笔者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在世界市场的底层逻辑和政治思潮的上层建筑中间存在行为体的能动性。一方面，行为体的种类是多样的。另一方面，行为体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理论”需要进一步阐述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类行为体的变化塑造世界秩序动力的机制，而这是本文在构建分析框架时的主要尝试。在研究世界秩序问题时，世界市场的逻辑和行为体的变化是“长时段”问题，即讨论相关问题需以百年为时间尺度。[16] 因此，如果以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变化作为解释秩序稳定和变革的因素，那么“长时段”涉及的周期划分问题就成为关键的方法。

三、“长时段”分析

（一）时段划分

既有研究对时段划分的意义存在不同的看法。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周期性的。因此，在他关于权力的“长时段”的分析中，权力的来源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但却缺少明确的时段特点。[17] 与之相比，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则将时段划分视为认识历史演变的工具，并以此作为“年鉴学派”的主要研究特点。[18] 对上述两种看法，笔者采取折中的态度：是否划分时段以及如何划分时段取决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时段划分是一种（但并非唯一的）认识世界秩序稳定与变革演变的工具。划分时段的好处是，研究者可以界定“变革”与“变化”的差异。前者指的是时段之间发生的重大性质变化，而后者指时段内部发生的程度变化。同时，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时段“分水岭”前后的因果机制，并在每个时段内部考虑秩序的稳定与程度变化。

既有研究对时段划分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即“静态分期”“突变周期”和“渐变周期”方法。其中，后两类方法是动态方法。笔者将首先讨论上述方法的特点，之后阐述以渐变周期方法研究世界秩序的原因。世界市场和行为体的变化具有渐变的特点。上述两者的变化构成了世界

秩序周期变革的逻辑。在每个周期中，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变化是大致稳定的，而行为体种类和政治思潮解释了周期内部的秩序稳定与程度变化。

（二）静态分期

如前所述，结构现实主义是“非历史性”的静态分析。然而，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极数”——对静态分期方法具有重要影响。国际关系史教材一般以“极数”的变化作为历史分期的方法。在“极数”不变的情况下，教材再以国际体系中出现或消失大国作为时段的标志。例如，国际体系在 1648—1945 年为多极体系，1945—1989/1991 年为两极体系，1989/1991 年之后为单极体系。在多极体系中，1648—1815 年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1870 年为维也纳体系，1870—1914 年为帝国主义体系，1919—1939 年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如前所述，采取上述分期方法的理论流派主要包括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吉尔平为代表的大国战争理论。

上述分期的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但这一分期方法存在三个局限。首先，这种分期方法具有静态的特征。在国际体系中，“极数”的变化速度是缓慢的。因此，严格坚持结构现实主义只会导致研究者认为国际体系经常处于稳定状态，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讨论世界秩序变革问题的

学术意义。[20] 其次，国际体系之间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为了分析这种变化，大国之间的战争被当成了主要乃至唯一的体系转换的动力。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国际体系总是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必然是由大国战争引起的？时至今日，关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历次危机的档案资料已经大量公之于众。1945—1962 年，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战争。但如果美国和苏联同时选择了对抗政策，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是否仍然稳定？即使没有世界大战，一个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世界是稳定的世界？1989—1991 年，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极数”，但是这种改变与世界大战无关。苏联以和平解体方式改变了国际体系。最后，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乃至仅仅依赖“冷战期间的两极‘稳定’”这一案例演绎体系稳定理论。冷战是一个历史上独特的事件，其中包含了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以冷战的案例推导关于国际体系稳定性的结论缺少普遍性。

（三）突变周期

如果“分期”（periods）体现了静态的逻辑，那么“周期”（cycles）就引入了变化的动力。权力转移理论是典型的突变周期理论。A.F.K.奥根斯基（A.F.K. Organski）、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呈现总体性的增长，而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率不同。经济水平奠定了军事基础。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的水平一般具有一致性。因此，不同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水平不同。在所有国家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霸权国。军事力量不断接近霸权国且发展速率高于霸权国的国家是崛起国。双方之间形成权力转移关系。权力转移在何种情况下会引发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如果双方之间实现了和平的权力转移，那么国际秩序是稳定的。如果双方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那么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因此，1750 年之后的国际秩序被视为争霸的交替周期，其主要研究案例包括 19 世纪末期英美和平的权力转移、20 世纪初英德争霸引发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英德争霸引发世界大战、1945 年之后美苏冷战。在这一过程中，界定周期最主要的“突变”是 1914 年和 1939 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1945 年之后的冷战。[21]

与静态分期相比，权力转移理论明确引入了秩序的动态变革机制，对分析国际秩序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变革视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霸权国与崛起国因其所具有的物质力量最大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

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这一组国家的双边关系把握国际体系中物质力量分配的主要特点和国家利益冲突的主要矛盾，从而以较为简单的方式分析较为复杂的国际秩序问题。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对理解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理论也存在四点局限。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秩序生成归因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双边关系。难道有且只有这两个国家塑造世界秩序？这两个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不仅包括中小国家，而且包括其他大国）对秩序的稳定和变革起了什么作用？出于分析目的，权力转移理论将这些内容从研究者对国际秩序的分析中抽离出来。这当然有利于构建简洁的理论。但如后文所述，在分析世界秩序的很多问题时，这种抽象未必恰当。

其次，权力转移理论的确引入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但是，具体到案例层面，权力转移分析的案例中的所有霸权国和崛起国都是民族国家，特别是 19 世纪末以来的民族国家。换言之，权力转移理论只讨论某类行为体（民族国家）且这类行为体在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中没有变化。然而，如后文所述，行为体的分类和变化会影响秩序的稳定与变革。

再次，在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下，每一阶段的秩序有且仅有两个特点——国际秩序的“稳定”或者“不稳定”成为被解释对象（因变量）的两个取值。简洁的取值有利

于理论建构，同时也遮蔽了不同阶段秩序的性质差异。例如，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20 世纪初期英德争霸和 1945 年之后美苏冷战争霸的国际秩序是类似的。然而，这显然与“世界政治理论”的看法不同。在分析世界秩序时，20 世纪初的英德争霸是帝国之间的争斗；而冷战时代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且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塑造了世界秩序。[22] 因此，权力转移理论实际上抽离了世界秩序概念中的观念因素。

最后，权力转移理论中的“突变”的出现，不仅是“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也与短期内的偶发因素相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然而，这种结构性因素不足以解释战争为何在 1914 年而非在其他时间节点爆发。战争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偶发事件（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突变”是秩序转换的机制；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是否以及何时出现“突变”。

（四）渐变周期

采用渐变周期方法分析秩序问题的理论有两种，即经济周期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分配是世界市场的底层逻辑，其变化发生在历史的“长时段”之中。经济生产是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周期的变化

和权力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经济周期理论为理解世界秩序的渐变提供了动态的视角。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讨论了世界经济整体的升降特点。第一次上升和下降为 1780—1851 年，第二次上升和下降为 1851—1896 年，第三次上升和下降为 1896 年之后。[23]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在政府作用有限的市场中，企业的周期与其所在经济系统的周期相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包括 1786—1842 年的周期、1843—1913 年的周期和 1919—1929 年的周期。每个阶段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24] 经济周期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并将经济周期视为一般性的规律。

然而，经济周期理论存在两点局限。首先，经济周期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的，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因素形成的制度塑造经济增长和衰退。然而，已有的经济周期分析侧重生产和价格的关系，对经济生产单位所处的社会条件分析不足，对经济周期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分析不足。自熊彼特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尝试通过严格的模型和系统的实证方法发展理论，以排斥具有随机性的社会因素（如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为代价构建普遍性的理论。然而，理论自洽的代价是高昂的——理论分析日益脱离现实。这就使得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出现了问题。例

如，无论采用何种划分经济周期的办法，在每一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受到类似的影响。然而，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国家会提前走出危机，而有的国家会长期陷入萧条。为何经济周期会产生国家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什么？经济周期理论没有解答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或许在经济因素之外。

其次，经济周期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界定的。这种分析当然具有合理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个体企业和整个经济系统具有强劲的生产逻辑。毕竟，资本的逐利性在世界市场中的表现非常抢眼。然而，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其他行为体对秩序的影响总是微乎其微么？在每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周期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行为体分析不足。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体不一定是国家。这些行为体建立的国家一定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经济周期的理论，这些行为体或者新建立的国家缺少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因此，它们并不能改变世界秩序。这种看法与“世界政治理论”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研究者理解世界秩序的变化不能仅仅依托经济周期分析。

与经济周期理论类似，世界体系理论也强调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处于渐变的周期之中。勒芬·斯塔夫里阿诺

斯（Leften Stavrianos）认为，经济生产方式塑造中心—边缘地区的相互关系。因此，他认为 1400—1770 年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770—1870 年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870—1914 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1914 年以来是防御性垄断资本主义。[2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强调经济周期塑造霸权。因此，他认为 1575—1672 年是荷兰霸权时代，1798—1897 年是英国霸权时代，1897 年以来是美国霸权时代。[26]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理论观点与沃勒斯坦类似，即强调经济周期塑造霸权。他认为，15 世纪到 17 世纪初是热那亚周期，16 世纪末贯穿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荷兰周期，18 世纪下半叶贯穿 20 世纪初期是英国周期，而 19 世纪末延伸至今是美国周期。[27] 王正毅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并更为强调以政治思潮界定世界体系。他认为，1500—1750/1800 年是古典重商主义时期，1800/1850—1914/1945 年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时期，1945—2030/2035 年是“混合经济”时期。[28]

虽然上述学者对世界体系周期的具体阐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均以渐变周期作为分析世界秩序的主要方法，揭示了经济周期与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的关系。与经济周期理论相比，世界体系理论是更为成熟和更为系统化的渐变周期理论，极大地推动了研究者对世界秩序的认识水平。

尽管如此，世界体系理论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均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对象，但其提出的时段划分相差却很大。斯塔夫里阿诺斯、沃勒斯坦、阿里吉强调霸权的经济基础，而王正毅强调霸权的文化特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世界体系的周期变化的基础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其次，世界体系理论的时段划分的基础是经济生产方式，而布罗代尔则明确批评纯粹以生产方式划分周期的办法。[29] 一些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也赞成这种观点。例如，阿里吉反对将金融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最新和最高阶段。[30] 一般而言，生产方式是混合型的，且生产方式是渐变的。如果仅以生产方式划分，则研究者难以确定不同时段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王正毅提出的周期的划分的起止时段均存在 30—50 年的时间区间是可以理解的。

（五）方法综合

在梳理既有研究对“长时段”的研究后，笔者认为应采取综合方法理解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迁。“分期”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难以解释国际体系之间的转化。“突变周期”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难以解释“突变”是否出现以及何时出现。“渐变周期”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比较适合分析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

革。在“世界政治理论”的框架中，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行为体变化均为“长时段”内的渐变因素。因此，渐变周期契合了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变化的速度，可用于解释秩序之间的变革。在每个渐变周期内部，秩序在性质上是稳定的，在不同侧面存在程度变化。世界市场和行为体的稳定解释了周期内秩序的稳定。与之相比，政治思潮是动态性较强的因素。同时，行为体的种类具有多样性。行为体种类和政治思潮相结合，解释周期内秩序的程度变化。

既有研究表明，无论采取何种时段划分方法，在时段转换的前后，多种因果因素和多种机制集中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推动了秩序的变革。[31] 这带来两个结果。首先，时段的起止时间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是一个区间。这种处理会使得渐变分析反映秩序变革的现实。当然，如果起止节点附近的区间过宽，则分析的严格性会有所降低。因此，平衡“解释力”和“严格性”就成为研究者必须考虑的因素。其次，在时段转换的前后，研究者面临辨识“多因一果”的挑战。解释和衡量“多因”对“一果”的作用，可以综合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事实上，在讨论同一问题时，不同学者可能采用不同的逻辑研究类似问题。例如，研究战争爆发的原因，沃尔兹的方法是进行层次分析，区分体系、国家和个人层次在何种情况下导致战争爆发，充分体现了形式逻辑在衡量不同原因相对重要性方面的作

用。[32]与之相比，A.J.P. 泰勒（A.J.P. Taylor）和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则采取综合方法研究战争。[33]他们的研究目的不是确定引发战争的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是展现不同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引发战争的逻辑。为此，综合使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就显得尤为必要。

沃尔兹以层次分析方法研究战争的原因，并取得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表明，形式逻辑在澄清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方面具有优势。形式逻辑特别适合研究者在因果关系相对简单和变量可控的情况下检验假设的解释力。例如，如前所述，权力转移理论在解释国际秩序方面存在局限。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该理论被提出至今，这一理论仍然是解释国际秩序的主要分析视角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理论将“国际秩序是否稳定”简化为“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相互关系”。这种简化存在失真的一面，但这种简化也使得研究者可以通过形式逻辑检验假设。例如，在权力转移的框架下，吉尔平提出了崛起国以战争挑战霸权国的假设，即“崛起战争”的假设。而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提出了霸权国以战争打压崛起国的假设，即“预防性战争”。[34]同一研究范式下，上述这两种假设的观点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有助于学者讨论每种假设成立的条件。

在分析世界秩序问题时，形式逻辑同样是有帮助的。例如，如前所述，分析行为体变化是讨论世界秩序变化的

一个重要方面。在分析行为体变化时，研究者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形态的演变。古代帝国如何变成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如何变成帝国？帝国如何解体或者异化？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止一条路径——有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如德意志统一战争），有的是通过殖民公司的演化（如哈德逊湾公司演化为加拿大）。在分析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对不同类型的行为体设置指标，并且测量国家建构的程度，从而判断行为体性质上的差异。这种以形式逻辑检验国家建构的方法，对研究者分析世界秩序变化同样有所帮助。

尽管如此，在分析世界秩序时，辩证逻辑同样不可或缺，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首先，辩证逻辑考虑了偶然性的作用。在世界秩序的研究中，行为体的“非本意结果”经常出现。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会造成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的“系统效应”。[35] 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差异所构成的偶然性可能导致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航海的目的是通过冒险获得个人财富，而他的行动却推动世界联系成为一体。他航海的目的与结果之间存在差异，而他在 1492 年成功“发现”美洲也具有偶然性。自然，在商业需求和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有别人“发现”美洲。然而，是哥伦布而不是别人在 1492 年“发现”了美洲。因此，辩证法不排斥确定性的因果解

释，但也承认偶然性因素塑造秩序。[36]

其次，辩证逻辑考虑“一因多果”的复杂性。例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战争破坏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37] 前者意味着战争摧毁了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创造的社会财富，但后者意味着战争的需求推动了经济机制的重建和资本的增殖。他的理论深刻论述了战争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的双重属性。按照形式逻辑的分析，即使一个原因带来多种结果，这些结果也不能存在矛盾。然而，辩证逻辑则承认这种可能。对世界秩序的研究而言，同一原因带来矛盾性结果的情势是经常出现的，而分析这种情势则要求研究者理解辩证逻辑。

最后，辩证逻辑考虑了“因果互构”的情况，即原因与结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也制造了战争。[38] 如果以形式逻辑讨论上述概念，那么研究者应当将蒂利的观点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假设。在讨论“战争制造了国家”时，因变量是国家是否和如何形成。因此，研究者应当界定国家建构的特点，之后罗列所有可能的解释因素，之后控制某些因素的影响，而集中讨论其他因素（自变量）的影响。之后，研究者再讨论“国家制造了战争”。这时候，因变量是战争是否爆发。研究者应当首先界定战争的概念，之后重复检验前一个假设的步骤。上述操作是严格

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者需要阐述“两个”因果关系。这容易导致割裂两个假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研究者检验假设时可能面临控制变量的困难。当研究者无法以严格的方式检验假设时，形式逻辑的优势就难以充分体现。最后，研究者在检验假设时需要划分时段，即首先要确定在某个时段内检验假设。如前所述，既有研究表明，不同学者对“长时段”的时段划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他们对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存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暗示了他们提出了不同因果解释以及解释背后的史观。史观决定了解释，进而决定了时段划分。因此，如果研究者划分时段的方式不同，其检验假设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同的。换言之，采用同样的形式逻辑的方式研究同样的问题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与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对这个例子的解释是更为简单的。在辩证逻辑看来，国家建构和战争进程是同一个历史区间内共变的两个趋势，而这正是蒂利采用的办法。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方法为目的服务。在讨论世界秩序问题时，研究者的目的是尝试理解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变化和运行的方式。因此，研究者综合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必要的。

四、世界秩序分析

（一）行为体的种类与变化

“世界政治理论”认为，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是解释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解释世界秩序的互补逻辑。世界市场体现了物质逻辑的重要性。世界联系成为一体与技术进步使得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全球的主要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周期性。因此，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具有周期性。与此同时，政治思潮的形成和变化体现了观念逻辑的重要性。政治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旦某种社会意识形成，社会意识就会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治思潮不能脱离世界市场而存在。然而，物质逻辑和观念逻辑的变化是不同步的。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技术进步推动世界市场扩张。“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却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前者融入全球贸易，而后者则推行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即使意识到了政策的成本，拉美国家也难以改变这一政策。这体现了拉美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变化与世界市场变化是不同步的。

在承认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作用的情况下，笔者将行为体的种类与变化作为解释世界秩序稳定与变革的第三个因素。首先，行为体的“种类”和世界市场、政治思潮相

互作用。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得行为体的种类出现了变化。例如，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得某类行为体积累经济财富和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日渐增长。民族国家就是这类行为体。世界市场的发展增加了民族国家的数量，增强了某些民族国家的能力。政治思潮的扩散使得超越国界和地区的社会运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例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不同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社会主义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成为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世界政治中新的行为体。反过来，某类行为体也会影响世界市场的运行和政治思潮的涨落，如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总量和货物流向，塑造了世界市场的特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强化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政治思潮的传播。

其次，行为体的“变化”和世界市场、政治思潮相互作用。行为体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在近 500 年的世界秩序中，一些行为体（如封建君主、殖民公司）消亡了；另一些行为体（如跨国公司）诞生了；还有些行为体（如民族国家）出现了“异化”。世界市场奠定的物质条件、政治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均可能导致某类行为体的兴衰。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古代帝国在与现代帝国的竞争中落败。像英国这样的现代帝国日益兴盛，而像奥斯曼土耳

其帝国这样的古代帝国则走向没落。又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保守自由主义的兴起对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产生了吸引力。这种政治思潮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从而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反过来，行为体的变化也影响世界市场的范围和政治思潮的内容。例如，英国从封建王权国家走向帝国的过程推动了世界自由市场的扩大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传播。由此，世界市场、政治思潮和行为体种类/变化三个因素发生交互作用。

最后，行为体的变化与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的变化在时间尺度上有所不同。三者组合可以增强“世界政治理论”对世界秩序稳定和变化的解释力。在“长时段”的分析中，每类行为体都会发生变化。对长期存在于世界秩序中的每一类行为体（如民族国家），其自身变化的时间尺度一般较长，可能以十年甚至百年为变化单位。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变化都是渐变的。世界市场的变化是周期性的，而某类行为体的变化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即使某类行为体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其变化的周期也可能与世界市场的变化周期不同。这就使得世界市场和行为体种类与变化均可解释秩序的稳定。在两者重合的时段，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很强。在两者不重合的时段，世界秩序出现了变革的动力。与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变化相比，政治思潮的变化速度更快。在

世界秩序的变革时期，政治思潮可能加速或者阻碍变革逻辑。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世界秩序中的行为体都是多样的。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可能影响行为体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共有规范等，而这些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世界秩序的稳定时期，行为体种类的多样性和政治思潮的变化解释秩序周期内部的程度变化。

由此，在研究世界秩序“长时段”的稳定与变革时，研究者应当将世界市场和行为体的渐变作为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综合考虑两者的相互作用确定时段周期。由此，笔者将近 500 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 1500—1750 年的“帝国建立”阶段、1750—1890 年的“帝国主导”阶段、1890—2010 年的“帝国内战”阶段以及 2010 年至今的“帝国分包”阶段。其中，1750 年前后、1890 年前后、2010 年前后为秩序变革期。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的时段划分如图 1 所示。

图 1 世界秩序的时段划分

时段	行为体种类	行为体变化	世界市场	政治思潮	世界秩序
1500—1750 年	封建君主 民族国家 殖民公司	民族国家发展	世界市场覆盖全球范围	自由主义的兴起 绝对王权的衰落	帝国建立

1750—1890 年	民族国家 封建君主 殖民公司 社会运动	民族国家巩固	世界市场塑造国内政治关系和国家间权力分配	自由主义及演化 社会主义及演化 民族主义的兴起	帝国主导
1890—2010 年	民族国家 社会运动 跨国公司	民族国家异化			帝国内战
2010 年至今		跨国运动活跃	世界市场分配不公加剧	民粹主义的兴起	帝国分包

（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1500—2010 年）

近 500 年来，世界市场产生了何种变化？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拓展是技术诱发的工业革命驱动的结果。例如，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使得世界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商品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大航海”时代的技术水平使得这种联系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有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大致相同的时段实现全球的联系。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增加了联系的手段和密度，从而使得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因此，在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工业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工业革命效果的显现需要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进蒸汽机作为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瓦特改进蒸汽机的那个时刻就出现和完成了工业革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历次工业革命。因此，比较合理

的估计是，在 1750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并完成。在 19 世纪末的最后 20 年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并完成。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并完成。2010 年之后开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至今尚未完成。历次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在每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了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的周期。

近 500 年来，行为体产生了何种变化？一般认为，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然而，1648 年前后，主权原则的影响远不及封建王权的影响。这时能称得上是民族国家的恐怕只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一国。直至 1750 年前后，欧洲大陆才出现了封建王权的相对衰落。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在领土边界内，官僚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如人口普查、征税、组建和维持常备军等。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大，官僚机构开始越来越多的独立于封建王权，从而挤压了封建王权的国内影响。其次，在领土边界外，殖民公司日益活跃。不仅议会民主制度的英国建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哈德逊湾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封建王权强盛的法国也建立了新法兰西公司、密西西比公司、东印度公司。对英国而言，海外殖民扩张是民族国家权力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两者并行不悖。因此，英国的殖民公司长盛不衰。对法国而言，海外殖民扩张是王权政治权力的伸张，

但资本积累也导致法国形成独立于王权的利益集团，两者存在张力。因此，法国的殖民公司往往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被收归王室所有。王室收并政策体现了脱离王室的殖民公司难以长期独立运行，也体现了王室对殖民公司独立性的忌惮。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情形，官僚机构和殖民公司的出现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并瓦解了封建王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因此，至 18 世纪 70 年代，英法基本上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国家。英国和法国在这一时段前后的政治革命不过是这两个民族国家对其在世界政治中地位的宣示。

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潮逐渐兴起并挤压了绝对王权的空间。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强调个体对政府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由此，“个体”变成了“公民”。自由主义思潮要求改革乃至推翻封建王权政府，并将王权残存的影响纳入民族国家的法治轨道。在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不仅是公民在领土边界内驯服封建王权的载体，也是保护公民在领土边界外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由此，自由主义要求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各国应依托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总经济效用的最大化。自然，个人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实现最大化。结果，民族国家不仅取代了古代帝国，而且民族国家也将超越自身的领土边界而成为现代帝国。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呼之欲出。

18 世纪中后期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行为体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现代帝国日益巩固。发生和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现代帝国。即使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基本完成了这种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超越国界的结果。在领土边界范围内，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力被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公民和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的义务。公民要纳税和服役，而国家要提供教育和社会保障。在领土边界范围外，帝国代替了封建王权和殖民公司，接手了殖民扩张活动。依托民族国家的资源，帝国进行扩张。依托帝国的资源，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臣民”和帝国之间形成了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臣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失去了原有的组织和运行方式，而被帝国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结果，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不是帝国的边界，而是帝国区分公民和臣民的地理边界。这种地理边界逐渐演变成为文化界限，巩固了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权力。

其次，反对民族国家/帝国的“反体系运动”出现并蓬勃发展。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阶级界限越来越清晰，利益集团的数量和活跃程度与日俱增，以参与政权或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开始出现。超越国界

的阶级、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横向联系日益发展。“反体系运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与第一国际相比，参与第二国际的政党的力量有所增强，数量大大增长，波及的地理范围更是遍及现代帝国的核心区域，并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边缘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扩散。“反体系运动”塑造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现代帝国纷纷采取各种政策缓和国内矛盾，如德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时，现代帝国纷纷支持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以缓和自身与弱小民族的矛盾。英国将“英帝国”改造为“自治领”，而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更是公开宣称支持民族自决。

政治思潮是解释这一时期革命、改革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绝对专制主义（无论是世俗王权还是神圣教权）淡出历史舞台。在政策实践层面，君主权力和权利都在不断丧失。“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革命引发的国际浪潮中彻底结束。“神圣同盟”宣扬的“正统原则”的影响日益衰微。有千年历史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将“奥地利帝国”改为“奥匈帝国”。就连曾经是世界精神主宰的教皇也退居梵蒂冈一隅之地。绝对专制主义的衰微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蓬勃发展。其次，自由主义既支持民族解放，也进行民族压迫。在希腊革命、波

兰革命、德意志革命、意大利革命中，自由主义谴责古代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俄国、奥地利帝国）压迫弱小民族。然而，自由主义也成为帝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种族主义使得自由主义理所当然地与政治暴力相结合，而使用暴力的目标正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的弱小民族。最后，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得这种思潮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从观念变为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

至 20 世纪初，世界市场的发展刺激了现代帝国的殖民诉求，也使得推动这种政策成为可能。一方面，现代帝国几乎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各自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互相竞争。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当主权观念尚未建立的时候，古代帝国以宗教思想穿越政治和地理边界。到帝国主义时代，当主权观念已经巩固的时候，现代帝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穿越政治和地理边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和现代帝国同向发展。民族国家通过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缓和“反体系运动”对自身的压力。在秩序周期内的国家间战争（如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德意志统一战争等）和革命（如 1830 年革命、1848 年革命、巴黎公社等）不仅没有破坏世界市场的发展和现代帝国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世界市场和现代帝国的作用。至 20 世纪初，世界形成了“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19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行为体再次发生显著变化。首先，民族国家出现了“异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冲击了现代帝国的原有秩序。然而，苏联逐渐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职能，并开始谋求在领土边界范围外拓展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换言之，苏联逐渐回归现代帝国的行列。对“帝国主导”秩序更为严重的冲击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即现代帝国之间大规模、持久性的武装冲突。除大规模的热战外，美苏之间的冷战也是帝国之间的内战。这些内战大大削弱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现代帝国。结果，原有的现代帝国之间出现分化。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代帝国。苏联与美国竞争，但却跌出了“两极”的行列。与美苏相比，其他现代帝国更是无法承担维持帝国运行的高昂成本（特别是高昂的军费），纷纷主动收缩国家涉外职能。例如，至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基本放弃了独立的核力量，而法国的“三位一体”核力量只具备象征意义。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英法的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支持现代核武库的维护与更新。它们丧失了现代帝国的能力和身份。与现代帝国相对应的是脱胎于殖民地的民族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大大增加了民族国家的数量。但绝大多数新成立的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涉外职能均比较脆弱。因此，总体而言，美国的民族国家有所强化。苏联的民族国家在强化后却走向解体。其他民族国家的职能都在逐步弱化。

民族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异化。

其次，“反体系运动”中涌现了大批民族国家和其他各类世界政治的行为体。民族解放运动增加了民族国家的数量，并使得“殖民地”、“委任统治”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某些行为体进入了民族国家的行列，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组织基础。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这一运动的行为体均成为了民族国家。在民族解放的时代，世界政治中仍存在大量游离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并且具有跨国属性的社会运动，如库尔德工人党。这些运动对相关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如库尔德工人党影响了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39] 此外，以议题为导向的跨国社会运动（如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也制约了民族国家的各类政策（如核政策、社会政策、贸易政策等）。

最后，自 19 世纪末世界经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取得优势。因此，这些企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由此，跨国公司逐步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政治中新的行为体。跨国公司不仅具有雄厚的资本，还能帮助母国在海外培植政治力量和代理人，从而形成跨国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网络。这种跨国资源能够

影响母国和所在国的生产安排、投资方式、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跨国公司甚至能够直接参与母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联合果品公司曾参与美国在拉美国家的政权更迭活动。[40]

世界市场的发展和行为体变化决定了“帝国内战”秩序的根本特点，而政治思潮的变化则解释了秩序周期内部的程度变化。首先，为解决经济社会危机，自由主义逐渐接受了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并通过美国的“新政”得以实践。政府职能的扩大导致官僚机构的运行成本上升。为解决社会经济效率下降的问题，保守自由主义应运而生。随着苏联的解体，保守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层面扩张，从而形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次，在无力解决经济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帝国主义走向极端，并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法西斯政权无法在世界市场中找到发展出路。于是，法西斯政权诉诸对外军事侵略。换言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潮包含了毁灭法西斯政权的因素。最后，俄国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建立后仅十多年，苏联就通过“斯大林模式”重新变为现代帝国。在同自由帝国主义竞争的过程中，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社会帝国主义”在物

质和观念层面没有取得胜利。在仍具备雄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苏联摒弃了“斯大林模式”并迅速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其“两极之一”的全球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大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推行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帝国内战”的结果。

简言之，“漫长的二十世纪”（19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是“帝国内战”的秩序。首先，除美国（和一段时期内的苏联）外，民族国家均处在“异化”的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国家的职能在弱化，并产生了法西斯政权这种“异类”的民族国家。其次，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帝国对其臣民形成了物质层面和思想层面的优势。帝国的内战不仅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包括美苏的冷战。虽然帝国内战的结果是美国成为仅存的帝国，但这一帝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力超过了 19 世纪的任何帝国的影响力。自 1945 年至今，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无不深受美国政策偏好的影响。最后，臣民的反叛不断加剧。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谋求民族独立的印度，还是以暴力方式实现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甚至是政权得而复失的“基地”组织，它们对帝国秩序的反叛使得现代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秩序周期内的工业革命（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改变世界市场的运行模式。这一时期的国家间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并没有改变行为体变化的趋势。

至 21 世纪初，世界仍处在“帝国内战”的余波之中。

（三）秩序的新变革（2010 年至今）

至 21 世纪初，世界市场和行为体均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于 19 世纪末。彼时，世界市场已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彼时，技术水平和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了。但这种增长对世界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却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分割所抵消。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未充分推动世界市场的发展。与之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在 21 世纪初。此时，美国成为唯一的现代帝国，而其竞争对手已不复存在。在扫清政治障碍的情况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成为常态。生产和消费的数字化、智能化成为经济和政治运行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日益活跃，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深度融合的产业分工和产业链。

进入 21 世纪，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也出现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主权国家的能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集中表现为“异类”国家的崛起。这里的“异类”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眼中的“异类”，一般而言指中国。在“帝国内战”的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市

场中的份额有限，技术水平处于全球的中低端，计划经济体制曾导致其长期与世界市场脱节。然而，至 21 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制造大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异常”不仅表现为经济体量大、经济增速快、经济具备内循环系统，而且表现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现代帝国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缺少独立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在物质层面，中国只有古代帝国的实践，而没有现代帝国的实践。这种实践也反映在政治语汇中。中国的政治语汇包含“王朝”、“天下”的概念；但现代帝国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思潮对中国而言纯属舶来品。上述物质和观念层面的差异本是中国与美国的重大差异。然而，美国政界和学界对这种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却讨论不多。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运动日趋活跃。世界市场推动了行为体的变化。世界市场的加速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公。2008 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危机爆发前，自由主义给出的经济发展的“药方”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发达经济体向国外转移实体经济，控制产业中上游和科技研发，同时发展金融产业。这种组合不仅意味着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可将社会问题（如劳资问题、环保问题）

转移至境外，而且无碍于国家安全。然而，推行上述政策的美国自身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结束之后，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却陷入了贫苦。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开始衰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公民采取集体行动对本国政府表达不满的“反叛”活动有增无减。

在世界市场的扩大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反体系运动”不再是阶级革命或者民族解放，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运动参与者诉诸选举解决贫富分化，并将矛头对准了全球化中收益的代表性群体——富人和移民。英国通过“公投”脱离了欧洲联盟，而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历次议会选举和民意调查中声望日隆。更为重要的是，主张“美国优先”的领导人特朗普已经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结果，民粹主义成为影响世界大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动力。例如，近年来特朗普总统对民粹背景的领导人，如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阿根廷领导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等，频频致意。2025 年德国联邦选举期间，特朗普总统的副手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不顾美德传统联盟关系，越过德国执政党而直接支持德国选择党，导致德国政府的抗议。这些跨国联系及其影响体现了民粹主义对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塑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帝国秩序出现了瓦解的迹象。秩序在区域层面和功能层面均出现了分裂。首先，某些“地区秩序”的发展使得世界秩序出现了破碎化的趋势。例如，21 世纪初期，世界市场的深度融合曾经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发展。然而，无论是已经搁置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倡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还是某些贸易大国加征关税的措施，都使得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了碎片化的特征。其次，某些“地区秩序”的垮塌加剧了世界秩序的破碎化。例如，21 世纪初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曾经将美国、欧洲与俄罗斯连接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欧洲的安全秩序。然而，伴随着英国脱欧和俄乌冲突，原有秩序目前分裂为数个战略性的双边关系，既包括战略合作关系，也包括战略敌对关系。原有的地区秩序不复存在。最后，某些地区出现了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的严重失调。例如，在 21 世纪的东南亚地区，中国长期是（除老挝之外的）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深刻塑造了地区经济秩序；而美国则对多个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深刻塑造了地区安全秩序。20 世纪 30 年代，中东欧曾出现了秩序的功能失调：德国的生产优势使其塑造地区经济秩序，而法国的联盟关系则塑造地区安全秩序。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地区再次出现了秩序的功能失调：西方国家对中东欧的贸易盈余和债权使美国

塑造地区经济秩序，而苏联的联盟关系则塑造地区安全秩序。过去的经验表明，秩序的功能性失调将可能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战争或长期社会经济危机。

上述三层秩序分裂已经深刻危及了仅存的现代帝国——美国。因此，自 2008—2010 年以来，美国尝试通过其联盟与伙伴体系重塑帝国秩序，力图推动形成“帝国分包”的新秩序。在经济层面，美国明确提出了所谓“友岸外包”的政策。美国负责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而将整个产业链分布于政治上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协调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在安全层面，美国加强了与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分包，强调武器系统的互操作性、情报信息的共享、军事训练协作以及军事基地投射影响力。自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开始至约瑟夫·拜登（Joe Biden）政府结束，包括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在内，美国的战略是基本连贯的，即以政治关系重塑美国的经济空间和安全边疆。

然而，至拜登政府执政末期，尝试以“帝国分包”政策重塑帝国秩序遇到了一系列困难。首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效果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在不断缩小。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友岸外包”政策的经济成本在不断上升。结果，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运行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忧虑与日俱增。其次，

美国的战线并未收缩。美国能力的相对下降导致其可撬动盟友和伙伴的资源在减少。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情况下，美国并不能保证在所有与盟友和伙伴的讨价还价中总处于优势地位。然而，美国战略焦虑的上升导致其对盟友和伙伴的需求在上升。结果，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从“与盟友和伙伴分享资源和共担风险”变为“对盟友和伙伴加征关税并迫使其增加军费”。最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降低了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并改变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内政治格局。结果，美国及其盟友均发生了变化，即从“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变为“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继续对外提供公共产品将面临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导致政权更迭。简言之，美国及其盟友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2008—2024 年，“帝国分包”政策依托美国已有的霸权而运行，但这一政策试图以政治逻辑凌驾于世界市场之上，从而人为拉高了政策的经济成本。同时，这一政策也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美国的“帝国分包”政策有一定效果，但效率不高。近年来，美国不断强调“本国优先”是其“帝国分包”政策难以为继的表现。特朗普再次当选前后已经意识到，继续运行原有的分包模式出现了困难。因此，他希望改变分包的模式以便重新配置资源。然而，他要求在短期内出现重大政策

调整，而这种调整本身的代价又是高昂的。这就很可能导致已经建立的“帝国分包”秩序彻底解体。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帝国分包”秩序解体的方式是什么？如果在危机状态下美国因错误认知卷入大国战争，那么“帝国分包”秩序将按照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那样以大国战争的方式结束。然而，如果核武器相互威慑等因素使得世界继续处于“大国无战争”的状态，那么“帝国分包”秩序可能按照“世界政治理论”预测的以下三种方式解体：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深化，且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失去了物质性权力的优势。二是世界市场加速发展，且美国不断发展的民粹主义导致政府选择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三是在国内外经济社会矛盾面前，政府陷入危机且无力摆脱危机，从而导致美国的民族国家职能逐渐退化。这三种模式是互补的。因此，即使美国能够维持“帝国分包”秩序，美国也将付出高昂的经济和安全成本。在目前的情况下，长期维持“帝国分包”秩序的稳定将是非常困难的。既然如此，继续尝试维持这样的秩序对美国和对世界均非福音。

五、结论

如前所述，“世界秩序”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概念。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和

“世界政治理论”均关心和讨论世界秩序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重点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既有研究或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缺少对体系变革的动态分析，或依赖大国战争等突变因素解释国际秩序变化从而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的秩序的稳定与变革。本文以“长时段”的综合分析方法，讨论了行为体种类和行为体变化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作用。世界市场、行为体和政治思潮的交互作用共同解释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变革。在分析世界秩序的基础上，本文或许可以对“世界政治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推动“世界政治理论”需要研究者以问题为导向。“英国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得到学界认可的原因在于，它们抽象出了研究的核心概念，嵌入了已有的研究议程而又不失去自身的特色。“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世界体系”。两者抽象的概念既独特而又不脱离既有理论。这个方法很值得“世界政治理论”借鉴。“世界政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丰富，研究对象的层次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抽象概念是检验已有理论和发展新理论的突破口。本文选择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作为解释对象，阐述世界秩序演变的过程性机制。一方面，“世界秩序”是既有研究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界秩序”问题足够重要

以至于既有理论无法忽视这个问题。自然，世界秩序并非“世界政治理论”研究的唯一问题。未来关于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可考虑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于某些概念作为被解释对象，并在“世界政治理论”的整体框架中寻找中介变量和因果机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推动“世界政治理论”需要研究者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长处，并在既有研究局限之处拓展自身的研究议程。“世界政治理论”的主要对话者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两者都要讨论民族国家政策互动形成的结果（例如大国战争）。第二，两者都要讨论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的作用。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政治理论”的差异是什么？第一，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已经有了世界秩序的问题。因此，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阶段，研究者不能用民族国家来解释世界秩序，而要考虑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在这个阶段，“世界政治理论”的“故事”里没有民族国家。第二，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的，至 19 世纪末期最终确定了在世界政治中主要行为体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政治理论”关于民族国家的“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当然，“世界政治理论”的“故事”中还涉及非民族国家（如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民粹主义等）。因此，在民族国家逐渐成型后，“世界政治理论”

同时包含了民族国家和“反体系运动”的“故事”。

在界定行为体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与之相比，“世界政治理论”界定的世界秩序的概念既包含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特征，也引入了新的因素（如“反体系运动”）。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均讨论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的作用。然而，两者的侧重不同。国际关系理论讨论“市场”，而“世界政治理论”强调市场在全球层面“长时段”的渐变。国际关系理论讨论“意识形态”，而“世界政治理论”强调政治思潮内容的多样性和变化。国际关系理论侧重解决现实问题，而“世界政治理论”侧重解释历史趋势。与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世界政治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发展了不同的研究议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研究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世界政治理论”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第三，推动“世界政治理论”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一方面，“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问题一般是宏观问题。这需要研究者具备较强的交叉学科背景，至少应实现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起初为研究者提供了切入研究问题的便利，而后来则逐渐变成了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属性。如果

一个问题只涉及一个学科，那么这个问题的意义可能比较有限。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学科。如果缺少必要的知识积累和准备，研究者可能连提炼问题和综述前人的贡献都有困难，也就更谈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研究者应当努力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并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实现知识结构的互补。

第四，推动“世界政治理论”需要研究者具备对知识的抽象能力。如果抽象程度不够或者不恰当，那么理论研究会陷入细节或失去方向。例如，飞机模型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一个体积很小的模型可以刻画巨大的飞机。真实的飞机只能停在停机坪上，而飞机模型则可以被携带至教室。在从飞机到飞机模型的过程中，大量的细节被抽象掉了。飞机模型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方便地理解飞机的物理特性。抽象的分析层次应高于对实际情况的描述，但又不能脱离实际。例如，飞机应当被抽象成为飞机模型，而不应被抽象成为火车模型。因此，理论建构对研究者的抽象能力要求较高。

最后，推动“世界政治理论”需要研究者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逻辑。任何方法和技艺都有适合其研究的选题。为解答这样的选题，研究者使用对应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这种方法的优势。同样，任何方法和技艺也都有其局限。如果研究者以不恰当的方法从事研究，那么方法的

优势将难以发挥，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研究者应当不断精进自己的研究水平，有意识地学习自己尚未掌握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简言之，“世界政治理论”对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只有达到了这种要求，理论研究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本文根据 2025 年 10 月 20 日《通州·世界政治论衡·第八讲》整理和修订。

2.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2; 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3.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1, 1990.

4. John Gerard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35, No.2, 1983, pp.273-274.

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8.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World: The Resilient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2018, pp.16-24.

9.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1984, pp.225-286.

11.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王缉思：《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版；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

14. 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5 期，第 4—26 页。

15. 宋伟主编：《世界政治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 年版。

1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三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 787—788 页。

17.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至四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年版。

18.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三卷》，第 81—82 页。

1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一至十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方连庆主编：《国际关系史 近代卷、现代卷、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6 年版。

20. 例如，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学者沃尔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必将从“单极”体系重回“两极”体系。但至于如何以及何时发生这一转变，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的理论应当回答的问题。参见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00, p.27。沃尔兹避而不答的做法表明，他对讨论国际体系变革缺少兴趣。

21.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22.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王缉思：《冷战的故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 年版。

23. Natalia Makasheva, Warren J. Samuels and Vincent Barnett eds., *The Works of Nikolai D. Kondratiev*,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4.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 年版。

25.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26.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至四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27.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 20 世纪》，姚乃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

28.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9—33 页。

29.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三卷》，第 91—95 页、第 788—790 页。

30. 阿里吉：《漫长的 20 世纪》，第 ii 页。

31. 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 年第 5 期，第 3—37 页。

32.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33. A.J.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61;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34.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6. 与“偶然性”相关的概念是“不确定性”。对世界政治中“不确定性”的讨论，参见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37. （德）维尔纳·桑巴特：《战争与资本主义》，晏小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

38.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39.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版。

40. Michael Grow, *U.S. Presidents and Latin American Interventions: Pursu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Cold Wa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